

数字阅读的批判性分析及其教育策略

荀 渊, 常乐融融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上海 260002)

[摘 要] 数字资源与数字媒体环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一代的阅读习惯与行为。媒介环境学对数字阅读、学校教育活动与学生学习活动的挑战,以及对读者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等方面的影响,对于分析学校教育如何应对数字媒体时代的变革具有重要的价值。由此,学校教育必须采取有效的策略,引导学习者学会从海量信息中遴选、甄别有价值的数字阅读资源,进行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阅读,进而成长为信息时代合格的数字公民,在恰当使用各种信息技术进行学习、交流与工作的同时,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广泛而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和共同福祉的实现作出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 数字媒介; 数字阅读; 媒介环境学; 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荀渊(1974—),男,宁夏永宁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教师教育政策研究。E-mail: yxun@dedu.ecnu.edu.cn。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媒介得以蓬勃发展,实现了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数字化^[1],随之蓬勃发展的数字阅读,在阅读范围、体验方式、阅读场景、阅读模式等方面,同样带来了人类阅读方式、行为的急剧变革。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2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我国数字阅读市场 2022 年总体营收规模达到了 463.52 亿元,同比增长 11.5%,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 5.30 亿,其中 19 至 45 岁为数字阅读用户主力,占比为 67.15%,且在校学生占比最高,达 53.41%^[2]。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借助各种数字终端进行阅读,教育无疑将面临诸多挑战。

正是因为数字媒介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引导年轻一代具备正确使用数字媒介、开展数字阅读的素养与能力。

二、技术变革与阅读媒介的变迁

自文字等符号产生以来,人类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载体来表达和记录人类的行为和精神活动。中国最早可查的文字,刻写在甲骨、青铜器等器物上,记录的主要是君王的功绩或祭祀、卜筮等活动,图案符号的历史则更为久远。此后,在阅读载体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技术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绢帛、竹简、纸张等材料开始普遍地应用于人们的书写,阅读便成为一种人类普遍的行为。特别是造纸术、印刷术的先后发明,为书籍的大范围普及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从而扩展了人类知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并且为个人收藏并通过品读来认识、理解与进一步解释自然、社会与人自身及其关系提供了可能。二战后,一方面,纸质媒介的书籍成为知识传播与学术研究成果呈现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广播、电视和录像机等视听设备的出现和广泛普及,书籍也逐渐以胶质、磁质、光介质等电子载体的形式出现,由于其可存储

的信息密度越来越大,传递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捷,使得人类的阅读活动变得更为普及^[3]。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电子设备、互联网以及数字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类阅读载体又一次经历了变革,基于数字媒介的阅读行为更加便捷、普及、易得,各种数字阅读形式层出不穷,使得数字时代的阅读拥有最广泛的读者与个性化阅读,人们对“阅读”的理解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革^[4]。

当然,数字媒体有着印刷媒体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如阅读环境的交互性、非线性以及阅读的即时性和文本与图像、音频与视频的同步性,从而使得人类的阅读方式在迈向数字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更为多元、更为个性化的趋势。与传统阅读主要是阅读者通过视觉的“看”来实现与文字所承载的知识、思想的互动不同,在数字阅读过程中,单纯的文字阅读转向了多媒体阅读,即以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为符号载体,阅读者不仅从视觉而且从听觉、触觉等感官渠道中获取信息并生成关于符号、文本的理解,从而成为“从符号中获得意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5]。同时,由于数字空间存储的信息量是纸质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基于互联网的超链接功能更是为阅读者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海量信息^[6],因此,数字阅读容量大、内容广泛,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要^[7],并借助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主机之间跨越时空限制的互通信息,使其具有显著的及时性、开放性等特征^[8]。总之,数字阅读过程中的及时性、开放性、交互性和沟通性,使得数字阅读逐渐变成了一站式完成“搜索、阅读、评论、分享”的一种社会性行为^[9]。就认知与学习而言,与传统书籍在阅读时遵循文字的线性逻辑并为读者提供自由思辨的空间不同,除电子图书外的数字阅读,主要是在借助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元素搭建的网络空间上进行。这种发散式的超链接阅读使得读者能够以联想的方式不断认知并突破思维定式,在拓展读者视野的基础上产生创新性思维^[10]。

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资源呈现出海量增长的态势,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乐于借助数据媒体进行阅读,数字资源与数字媒体环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与行为。通过使用数字终端设备,对电子图书和以知识传播为主的APP、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数字新媒体提供的数字资源进行阅读^[4],意味着在阅读环境、与数字资源的交互上呈现出一种数字化的特征^[11]。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新媒体不仅为人们的日常交往与知识传播搭建起了交互性、开放

性、共享性、及时性、虚拟性的数字化环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个体间、个体与知识、社会互动更为复杂多样的新样态^[12]。

三、数字媒介的教育应用与数字阅读的批判性分析

作为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种有效机制,教育参与并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人类主要借助视听符号进行交流与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看,教育以及阅读就其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实践活动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媒介环境学就发轫于一个独特的假设:媒介影响教育应该成为教育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13]。在媒介环境学看来,媒介环境对教育的影响诞生于教育产生之初,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文明、教育漫长的发展历程^[14],媒介技术的变革甚至是教育模式最有影响力的变革动因^[15]。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环境不仅影响使用媒介并在对媒介形成一种依赖时决定了我们从中获得什么,而且媒介所提供的路径和方式影响着我们对知识所持的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教育与文化的形态^[16]。

在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解释语境下,与媒介演变史上先后出现的语言、印刷、电视、电脑等媒介技术相对应,人类教育史上也依次经历了“口耳相传”的教育模式、“课堂中心”的书本阅读模式、“没有围墙”的视听阅读模式和“超越时空”的网络阅读模式。二战后,人类进入了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时代^[17],麦克卢汉将电视界定为一种冷媒介,具有低清晰度、使人深度介入的特性。在他看来,从书面文化派生出来的视觉文化,偏重连续性、同一性和连贯性,而电视中的马赛克是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性的^[18]。波斯曼在他著名的《娱乐至死》中,将教学视为一种娱乐活动,指出“电视式学习”正在改变传统的学习概念^[19]。波斯曼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教育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使得教育研究必须重新定位大众所持的学习态度,教室日渐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19]。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政治以及媒介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以印刷技术时代的经验为基础的教育学家们开始察觉到课堂里发生的微妙而深刻的变革,他们思考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熟悉的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文字阅读和教育,究竟出了什么事?作为媒介环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波斯曼最先关注到了社会环境变革对文化与教育的冲击,并意识到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的转变带来的媒介环境的变革,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阅读方式、文化与教育的发

展路径^[13]。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从录音机、录像机、幻灯片、闭路电视,到计算机、液晶电视、投影机、多媒体中控系统、电子白板等,教育媒体种类越来越丰富^[20],多媒体教学日益成为现代化教育的主要模式。就其本质而言,多媒体课件广泛的应用,恰恰是电子文化入侵教学环境特别是阅读环境的集中体现^[21]。更具体而言,多媒体课件在课程教学中呈现出表现力强、操作简捷、信息量大、可无限复制与共享等优势,使得多媒体课程不仅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视听感知与阅读环境,而且构建了一种以视听觉为主的阅读、学习、认知路径,展示了虚拟化、数字化和便携的优势。当然,也存在将“知识”混同于“信息”的潜在可能,从而使得教育教学活动渐渐从知识的传承转向了信息的传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进行知识的自我建构的可能性^[21]。

进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互联网以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表达符号丰富、记录准确、支持双向传播的优势成为所有媒介传播技术的集大成者,印刷时代将不可避免地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17]。互联网阅读与学习环境带给学生个性化学习、双回路学习、社交化学习等多样化的学习体验,学习者可以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课程的无缝阅读与学习^[22]。学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来加强课堂阅读与学习,但更多的是疏离了原有课堂文化空间和教学空间,导致教师教的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数字媒介还在解构着自古以来课堂教学一直得以延续的内在逻辑:在传统课堂教学中占据主导的知识的系统化、线性思考与理性思维方式,正在被学生思想、知识的碎片化、非线性和无深度等特征所替代。学生很难有耐心听完一堂较长的课、阅读一篇长文章,自然地排斥逻辑复杂的讲解和课堂深奥的知识,他们的课堂发言和写作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逻辑不清晰、语言不规范的特征。此外,作为闯入课堂的不速之客,数字媒介裹挟学生向教师和课本的权威与中心地位发起了挑战。笔记本、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终端,连同互联网更为丰富的数字资源,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师的知识权威角色,而且在大大拓展课堂师生间、人机间的交互性的同时,正在重塑新的课堂教学的文化形态^[23]。

此外,媒介环境学同样关注到了数字阅读对教育过程中人的认知、身份认同和权威建构的影响^[4]。从口语文化到文字文化,从图像符号转向表征、推理符号的转向,对不同符号的接受与普及程度,带来的是人类认知方式与结构的变革^[18]。在传统纸质文本阅读中,阅读者所面对的表征性符号在数字阅读中被还原

为图片、图像、动画、声音、语言、文字等视听符号,从而触动人们的视听感官来进行学习。数字阅读的跨媒介超链接技术带来的发散性自由阅读体验,不仅有助于提升读者的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而且对读者的语言与想象力、注意力的引发与维持都有一定的增强作用^[24]。不过,由于数字阅读媒介将信息化为比特、字节可无限分割、剪切,造成认知的碎片化、连续性断裂等问题,而且与传统阅读中身份认同的建构具有稳定感、统一性和隔离性等特征不同,数字阅读的互动性带来身份认同的立体化与流动性。在数字媒介技术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双重合力之下,传统阅读中的权威被一一解构并产生新的格局^[24]。还必须看到,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人们的学术阅读逐渐由成篇章的整本书、整段落的系统化学术阅读逐步转向碎片化的信息与知识的快速获取,而新媒体呈现的学术阅读信息海量丰富、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以及使用者逐渐养成的被动接受各类学术资讯的习惯,使得总体上以数字新媒体提供的数字资源为对象的学术阅读往往导致阅读者缺乏独立思考的意识^[25],更不利于学生系统的知识和经验的生成。

四、应对数字媒介与数字阅读的教育策略

从本质上看,不管是纸质阅读还是数字阅读,人类的阅读行为指向的具体对象都是人类经由主体经验对感知、认识的对象进行表达时所创造出来的符号,这种符号包括了推理性符号模式和表征性符号模式,前者主要是以文字、数字或点线面表达的真实性、命题式的语言和数学,后者则包括绘画、摄影、音乐、舞蹈、雕塑、建筑、文学戏剧和电影等艺术形式^[13]。正是这些符号借助不同形式的技术构筑了人类赖以学习、互动和生活的媒介环境。与此同时,从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再到数字时代,传播媒介的演变又与社会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显然,进入21世纪,现代人类毫无疑问生活在传统、电子与数字媒体混杂在一起的媒介环境中,媒介不仅对个体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成为一种塑造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进入信息时代,数字化新媒体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营造出的媒介环境正在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数字媒介对教育领域的影响也成为媒介环境学学者们关注的内容。

显然,数字媒体的到来,加上超文本的碎片性正在威胁持续的阅读^[26],以至于在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缺乏深入阅读的能力,也缺乏长时间投入有效阅读的能力^[27]。更为关键的是,随着人的生存与

社交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媒介依赖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通病。从社交媒体建立的感知环境来看,视觉、听觉、触觉多感官同时卷入的社交媒体,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社交媒体作为一种不设门槛的草根媒体,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权利。在社交媒体建立的符号环境中,“快阅读”“浅阅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常态。由此导致的信息“快捷化”“碎片化”“浅表化”无形中加剧了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尽管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融合”的社会环境,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让人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更快捷地获取信息,但是在快餐式的浅阅读状态下,人们会在无序的信息空间迷失独立思考的能力^[28]。正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所说,“在网上浏览和搜索时,我们失去的是平静和专注思考的能力,而这种思考是沉思、反省和内省的基础。网络从来不会让我们慢慢思考,而是使我们的精神永远处在奔波之中。”^[29]

此外,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的“人—机—人”的交流方式,具有虚拟化、间接性和高度自由性的特点。那些试图摆脱现实世界各种困境与难题的人们,更乐于在虚拟世界中自由地表达和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从处于现实的场景、活动中的多向度网络走向虚拟空间、视频化互动的单向度网络。社交媒体似乎营造了人际更好的沟通,人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实际的情况是,由于现实的社交活动正在被替代,处于特定现实生活空间中的个体越来越少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因而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孤独^[30]。更为严重的情形是,悬殊的阅读条件差异带来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阅读鸿沟,不良的阅读习惯正在严重干扰正常的生活、学习与工作,不当的阅读行为更是严重威胁着青年一代的身体健康,甚至沉迷于消极的数字内容正在导致青年一代心理失常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不实信息严重误导科学认知与是非判断导致一些青年无法正确地认识、应对一些涉及道德、常识的社会问题,而自媒介场域形成的去主流化文化心理等更是涉及层面多、程度深、范围广^[31]。此外,“大数据时代”隐私泄露的风险、新媒介技术对私人世界的入侵、对现实环境的异化、对真实生活空间的侵蚀作用越来越明显等,都已经成为数字媒介化的当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话题^[32]。

媒介环境学批判性地揭示了电视时代、数字时代人类媒介环境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于现代人类的生活而言,可能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存、社交环境与形态的变化,可能更意味着人类主体性的逐渐削弱。作为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之一,保罗·

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Anthropotropic Theory)进一步主张,推动媒介进化的根源是人的选择,在媒介的发展进程中,媒介的发展是不断趋近于符合人性需求的形式,即媒介演化表现出一种人性化的趋势^[33]。或者说,为了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需要,一方面,人需要对技术和媒介作出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媒介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对人需要的满足,以及基于这种需要的满足,在促进社会的进化上所发挥的作用^[34]。这无疑为我们应对数字媒体时代的挑战,重新思考数字阅读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重建一种稳定的旨在强化人的主体性、构建良好的人与媒介交互影响的新机制。

首先,我们一直将客观的媒介环境视为一种人类不得不适应进而塑造人类生活方式的外部力量,恰恰忽视了对于环境的适应主要还是来自于人类个体、群体的选择。面对数字媒体承载的海量的数字阅读资源,必须通过教育让人们意识到,阅读行为的主体依然是人自身,媒介环境固然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与阅读行为,但阅读什么、如何借助媒介以及花多少时间来进行阅读,必须由作为阅读主体的人来作出选择。这种选择不是无意识地沉湎于数字媒体提供的数字资源之中,或者有意识地满足于快速阅读、碎片化阅读、音视频体验阅读带来的短暂愉悦,而是选择既满足于阅读偏好、兴趣的阅读主题与内容,能够在阅读中通过批判性思考,促使知识、思想和精神等方面的有效提升。

其次,鉴于数字阅读内容来源广泛、拥有海量信息等特点,要通过必要的教育内容设计,让每个处于教育环境之中的学习者,充分认识到数字媒体环境中的数字阅读优势和可能带来的弊端。特别是从主体选择的角度,引导处于学校教育环境之中的学习者,掌握以浏览、泛读、跳读等方式获取新知的技巧,并基于自身的兴趣与偏好,学会从海量信息中遴选、甄别有价值的数字阅读资源,进行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阅读。在这一过程中,要引导学习者将呈碎片化阅读的数字阅读,与以纸质阅读材料的系统阅读结合起来,从而既能够发挥数字阅读带来的利好,也能消弭数字阅读可能带来的诸多弊端。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要发挥数字阅读的各种优势,积极引导合作研讨、交流互动,在一种数字、现实的互动情境中深化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构建一种合理、有效的数字化集体学习的行动结构^[35]。

再次,鉴于数字阅读对个性化阅读需求的满足程度高,教师要有意识地在课程教学中发挥数字新媒

体、数字阅读资源的优势,通过遴选高质量的数字阅读资源并将之纳入课程学习资源之中,在激发青少年阅读与学习兴趣并满足其多样化学习需要的基础上,引导学习者将课程阅读资源与数字阅读资源、随机性阅读与目标性阅读、兴趣与偏好主导的阅读与有价值的主题阅读结合起来,培养适应数字新媒体环境的能力和选择、甄别数字阅读资源的能力。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在让数字资源阅读成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的基础上,加强真实教育教学情境与数字虚拟环境的结合,既注重培养学习者借助数字新媒体和在数字环境中的自主学习的能力,着力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也通过强化现实问题、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的设计,加强学习者的合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以引导学习者全面地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诸多挑战。

五、结 语

数字化代表着人类传播媒介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带给人类的是一种全新的生存、生活的方式,不仅

使每个个体都能够自由穿梭于真实的物理空间与数字虚拟空间之间,而且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传播、沟通交流和从事学习、工作等活动^[36]。不过,对于积极拥抱数字化时代的青年一代而言,在数字环境中进行数字阅读,进而在数字阅读过程中能否养成符合时代需要的各种信息素养,以及能否具备查找、使用各种信息资源解决问题的信息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趋势的程度与水平^[37-38]。只有通过积极应对数字技术,充分适应数字环境,开展有价值的数字阅读,青年一代才能具备信息社会必需的信息素养与能力,才有可能在信息社会之中实现个人的理想与愿景^[39]。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学校教育中持续地加强对青年一代信息素养与信息能力的培养,才能使青年一代逐渐成长为信息时代合格的数字公民,在恰当、负责任地使用各种信息技术进行学习、交流与工作的同时,在遵循信息时代道德、伦理与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借助信息技术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和共同福祉的实现作出独特的贡献^[40]。

[参考文献]

- [1] 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6):66-69.
- [2] 史竞男.冯源数字阅读撑起全民阅读“半边天”[N].经济参考报,2023-04-27(005).
- [3] 侯壮.大学生数字阅读[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4-7.
- [4] 吴瑶.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数字阅读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6.
- [5] 王余光,徐雁.中国读书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0.
- [6] 袁静.网络阅读与传统图书阅读的区别[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2):153-156.
- [7] 宋巧会.网络阅读的特点及问题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08(4):25-26.
- [8] 刘莉.阅读的去、现在与未来[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8):83-85.
- [9] 刘淑华.数字阅读的新特征与后现代反思[J].青年记者,2017(11):8-9.
- [10] 吴瑶.数字阅读:媒介进化论视野下的阅读进化[J].新世纪图书馆,2016(3):5-8.
- [11] 姜洪伟.数字阅读概念辨析及其类型特征[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9):9-11.
- [12] 左璐.媒介环境学视野下移动互联网传播及其影响研究[D].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2014.
- [13]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第一版)[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7,208.
- [14] 李永智.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教育信息化 2.0[J].新闻爱好者,2018(9):46-50.
- [15] 李曦珍.理解麦克卢汉:当代西方媒介技术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50.
- [16] 王书林,肖伟胜.媒介环境学视野中的多媒体教学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26-132.
- [17] 郭文革.教育的“技术”发展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9(3):137-157,192.
- [18]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55周年增订本)[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376-412.
- [19] 尼尔·波斯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170-184,196-198.
- [20] 王运武,黄荣怀,杨萍,王宇茹.改革开放40年:教育信息化从1.0到2.0的嬗变与超越[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9,33(1):1-7.
- [21] 周方.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多媒体课件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3.
- [22] 易凌云.互联网教育与教育变革[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 [23] 湛兵.数字媒介重构大学课堂文化[J].江苏高教,2015(2):86-88.

- [24] 吴瑶, 韦妙. 数字阅读中对传统权威的解构[J]. 青年记者, 2019(21): 28-29.
- [25] 聂兰渤. 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学术阅读的影响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9.
- [26] HEALY J. Endangered minds: why our children don't think[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 [27] BIRKERTS S. 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M].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4.
- [28] 聂莺. 媒介环境学视野下的社交媒体依赖现象[J]. 东岳论丛, 2015, 36(2): 189-192.
- [29] 尼古拉斯·卡尔. 互联网抑或使人更愚蠢? ——互联网正在影响人们的深度思考能力[J]. 世界科学, 2010(8): 18-19.
- [30] 雪莉·特克尔. 群体性孤独[M]. 周逵, 刘菁荆,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 [31] 丁以绣. 数字阅读的负面影响如何消解[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2-05-25(003).
- [32] 刘丹凌, 赵娟娟. 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J]. 学术论坛, 2014, 37(4): 101-105.
- [33] 袁静. 网络阅读与传统图书阅读的区别[J].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2): 153-156.
- [34] 杨瑞丽. 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论探析[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2: 31.
- [35] 陈勇, 何彦秋. 数字阅读对青少年学习力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J]. 教育探索, 2019(3): 12-15.
- [36]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 [37] 霍华德·莱茵戈德. 网络素养: 数字公民、集体智慧和联网的力量[M]. 张子凌, 老卡,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
- [38] UNESCO, NCLIS. The prague declaration towards an information literacy society [R]. Information Literacy Meeting of Experts, Prague, The Czech Republic, 2003-09-20.
- [39] 钟志贤. 面向终身学习: 信息素养的内涵、演进与标准[J]. 中国远程教育, 2013(8): 26-28.
- [40] 杨浩, 徐娟, 郑旭东. 信息时代的数字公民教育[J]. 中国电化教育, 2016(1): 9-16.

Critical Analysis of Digital Reading and Its Educational Strategies

XUN Yuan, CHANG Lerongr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Digital resources and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s are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reading habits and behaviors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 on digital reading, 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n readers' identities and social identities, are of great value in analyzing how school education can respond to the changes in the digital media era. Therefore, school education must adopt necessary strategies to guide learners to learn how to select and screen valuable digital reading resources from massive information, to engage in purposeful, meaningful and valuable reading, and to grow up to qualified digital citize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hile appropriately and responsibly using variou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communication and work, they can extensivel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life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k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gress, civil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well-being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Digital Media; Digital Reading; Media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Strategies